

奥斯曼帝国苏莱曼盛世简析

姜明新

内容提要 苏莱曼一世以其卓越的文治武功创造了奥斯曼帝国的盛世辉煌，为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光荣与繁荣。但也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帝国社会形成了后宫干政、朋党政治、财经困境，以及对米勒特特权滥用等问题。其后果是，这不仅终结了奥斯曼帝国连续十世的明君政治时代，而且在事实上成为了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的开始。这些弊病也为其后困扰奥斯曼帝国数个世纪的麻烦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 政治史 奥斯曼帝国 苏莱曼一世

作者简介 姜明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7）。

盛世情怀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每一个强国后人心理上难以逾越的一个心结，也是现实比拟的一个精神参照系。但仔细研读历史会发现，盛世荣光并非如我国强汉盛唐、天宝当年那样令人神往，更不像奥斯曼帝国金戈铁马、气吞万里那样令人思古追怀。在奥斯曼家族统治土耳其的624年里，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个时代：前3个世纪可以视为奥斯曼土耳其的光荣时代，也是奥斯曼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效率原则一步一步发挥到极致的时代；后3个世纪是奥斯曼帝国衰败与变革的时代，也是伊斯兰传统观念与西方思想相互冲撞、土耳其人逐步容纳进而接受某些西方思想的时代。但我们并不能将奥斯曼晚期的痛苦与挣扎、屈辱与无奈全部归因于奥斯曼帝国中后期“礼崩乐坏”等原因之上，实际上，极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就已经为衰败埋下了苦涩的种子。

苏莱曼盛世概述

至今,苏莱曼大帝时期的盛世荣光依然存留在土耳其人的记忆里,承载着许多土耳其人的梦想。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位英武盖世的君主自1520年26岁登上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大位之后,即承先祖之武勇、奋九世之余烈,极力弘扬加齐精神,以“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万王之王”^①自居,屡屡披坚执锐、御驾亲征,其兵锋所指,所向披靡:攻陷欧洲重镇贝尔格莱德(1521年8月29日),从此打开了进攻中欧的大门;迫降长期盘踞罗德岛、劫掠过往穆斯林船只的圣约翰骑士团(1522年12月20日),拔掉了欧洲人顶在奥斯曼人胸口的一柄尖刀;于普雷维扎重创了第二次欧洲神圣同盟的舰队(1538年9月28日),让地中海几乎成了奥斯曼帝国海军的内海;向西横扫匈牙利平原,围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529年9~10月),打得崛起中的欧洲强权哈布斯堡王朝丢盔弃甲、风声鹤唳、求和纳贡^②;向东屡破波斯沙法维王朝,几克波斯都城大不里士、占领伊拉克及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旧都巴格达(1533年11月),其兵威所至、凶悍的波斯人只能退避三舍、焦土避战、勉力周旋……

苏莱曼大帝在其46年辉煌的征服生涯里,将专制主义的效率发挥到了极致,纵横欧亚非、笑傲地中海,成为其时令四方敌人闻声丧胆的最伟大的伊斯兰征服者,也是维持当时欧洲各国势力均衡的强大力量、伊斯兰世界当仁不让的领袖,更被欧洲人以苏莱曼大帝的尊号将其载入史册,创下伊斯兰世

① 参见苏莱曼大帝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ois I)的信。

② 1533年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伊斯坦布尔签署和约。和约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被称作西班牙国王,其弟斐迪南大公视苏丹为“父亲和宗主”,认大维齐为“兄弟”,并确认匈牙利平原和特兰西瓦尼亚属奥斯曼帝国,但保留匈牙利西北部边境地区,其条件是每年向苏丹纳贡。此外,如同“征服者”默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迫使拜占庭帝国的大批学者逃往意大利从而催生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迫于苏莱曼大帝军事进攻的压力,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被迫向德国新教徒让步以换取其支持,这为日后欧洲宗教改革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参见[美国]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奥斯曼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另一方面,奥斯曼人也支持基督教新教教派,期望在基督教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寻找政治同盟。参见[俄]伊兹科维兹著;丰德培译:《帝国的剖析》,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0页。

界迄今为止空前绝后的不世之功。^① 截至 1566 年苏莱曼一世辞世之时，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覆盖了当今全部或部分的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克里米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门、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等地区^②，总人口也从 1 200 万增长到 2 200 万^③，留下了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信仰多元共存的伊斯兰大帝国。

这位伟大的伊斯兰君主不仅与其先祖一样武功盖世，其文治也尽显辉煌。在后世土耳其人心中，他首先是奥斯曼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者”苏丹苏莱曼。在其统治期间，他招徕并重用了数百名帝国内顶尖的伊斯兰学者，在整理、修订旧律的基础上，长年累月地推出新律，即使是在其征伐时期也不例外。在苏莱曼大帝的参与或组织下编纂而成的著名的成文法典，包括 1530 年的《群河总汇》、1532 年的《埃及法典》和 1566 年的《苏莱曼法典》。尤其是以其名义制订的《苏莱曼法典》基于伊斯兰法、糅合了其他民族的传统法律和习俗，既坚持了伊斯兰原则，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它突出强调了公正和财政，对整个帝国机构进行了系统化和制度化，从而强化了中央集权。这几部法典奠定了奥斯曼法律制度的基础，其后一直实行了 300 多年，直到奥斯曼帝国宪政革命。

不仅如此，苏莱曼一世推崇、倡导伊斯兰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对其时和后世的土耳其人来说，他是“高尚的君主和宽宏正义的化身”^④。自登基伊始，他就着力创建一套公正的体制，强调保障生命、财产并尊重个人信仰自由，税收仅以人民的支付能力为限。他改组政府，整饬吏治，侵犯臣民权利的官员就会受到严惩。他推行良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改良米勒特制度，给予非穆斯林少数族裔和外国人以某种程度的内部自治的权利。他以法律的形式提高了非穆斯林臣民的地位，轻徭薄赋，从而吸引了大批基督教民众投

① 这点也可从苏莱曼大帝本人的全称上得到最好的体现。其全称为：“苏莱曼一世陛下、出身奥斯曼皇室的君主、是苏丹之苏丹、可汗之可汗、全体信徒们的主宰与真主先知的继承人、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圣城的保护人……以及众多其它国家和城市的皇帝。”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uleiman_the_Magnificent, 2012-02-14.

② 参见〔俄罗斯〕伊兹科维兹著；丰德培译：前引书，第 34 页。

③ 这一数字为估计值，各家多有差异。本值参见〔美国〕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前引书第 138 页。

④ Lord Patrick B. Kinross, *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 William Morrow & Co, New York, 1979, p. 205.

奔奥斯曼帝国甚至皈依伊斯兰，而这也是巴尔干等基督教地区的人民倾向异教的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颁布敕令，废除迫害犹太人的血祭诽谤，^①在犹太人遭受欧洲基督徒残酷迫害的时期接纳了大批犹太人。^②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定居在土耳其共和国，而在阿以矛盾尖锐对立的中东穆斯林地区，土耳其和以色列两国却长期保持着良好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土耳其人与居住在土耳其的犹太人和睦相处，这些都不能说与奥斯曼帝国和苏莱曼大帝接纳和保护犹太人的政策没有渊源。

苏莱曼一世治国方有方，是一位杰出的君主，在许多方面他都将奥斯曼帝国推向了其时无与伦比的繁荣与光荣。作为一名卓有成就的诗人和金匠，终其一生，他大力资助帝国境内文化、艺术、建筑事业的发展，取得了蔚为壮观的文化成就，有些成就如杰出建筑师希南设计的伊斯坦布尔苏莱曼尼耶清真寺，气势恢宏，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所有这一切让这一时期成为了奥斯曼帝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

苏莱曼盛世所隐藏的四大问题

但是，仔细研读历史，透过苏莱曼大帝辉煌的文治武功，我们不难发现，专制主义在以其特有的效率创造着奥斯曼帝国的盛世传奇的同时，也以其特有的效率、通过专制主义最关键也最薄弱的节点——君主——帝国内唯一自由的人、为日后困扰帝国数个世纪的麻烦埋下了伏笔。这些问题相互间盘根错节，主要包括：

（一）后宫干政

后宫干政几乎是古代东方专制帝国的一大特色，它在大多数时期都被史家看成是君主衰弱的一个标志。也正因如此，从东方辗转迁徙而来的奥斯曼帝国王室在初期是禁止后宫妇女涉足国家政治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帝国初期君主“胜者为王”的血腥继承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君主强悍冷酷的性格让后宫妇女难以干预国家政治，更不用谈染指奥斯曼皇位的继承；另一方面可能

^① Phillip Mansel, *Constantinople: 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 1453 - 1924*, St. Martin's Griffin Press, 1998, p. 124.

^②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前引书，第240页。另参见黄维民著：《奥斯曼帝国》，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也与奥斯曼国家接受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宗教习惯有关。

但是，苏莱曼一世是其父“冷酷的”塞里姆一世唯一的儿子，^①这在奥斯曼帝国初期胜者为王的环境下是罕有的幸运，可能也正由于无人竞争这一幸运，让年轻时的苏莱曼平添了几分宽厚和柔情，而这也正是苏莱曼的生母与宠妃、尤其是后者能够长期干预朝政并发挥重大政治影响、甚至影响奥斯曼帝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基础。而始自苏莱曼时期的后宫干政现象则是其后、尤其是十六、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一大突出特征。

严格说来，奥斯曼帝国后宫干预朝政始于苏莱曼大帝的生母艾谢·哈夫莎苏丹（Ayşe Hafsa Sultan），她也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太后（Valide Sultan）头衔的苏丹生母。作为唯一皇位继承人的生母，长期以来其政治地位十分稳固。而在苏莱曼登基之后，由于奥斯曼皇室的传统，苏丹苏莱曼非常热爱和尊敬她，这也是她能对帝国政治发挥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据记载，哈夫沙苏丹与苏莱曼的宠妃胡蕾苏丹（Hürrem Haseki Sultan）^②、代夫沙梅势力相勾结，直接策划、参与了罢免突厥贵族出身的前朝老臣、大维齐皮里·穆罕默德帕夏（Piri Mehmet Paşa）的阴谋，为自己收养的奴隶、门徒和未来的女婿帕尔加勒·易卜拉欣帕夏（Pargall Ibrahim Paşa）执掌大维齐职位13年铺平了道路。^③

哈夫沙苏丹虽然母以子贵，但在政治手腕、政治战略与谋略、对苏丹和帝国政府的控制与影响及其历史地位等方面远远不及苏莱曼的宠妃胡蕾苏丹。作为一个女人，胡蕾苏丹长袖善舞，智败宠妃马希德夫云（Mahidevran）^④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让苏丹苏莱曼心甘情愿地为其打破了奥斯曼帝

① 也有塞利姆一世杀子之说，但史无记载或实据。See Leslie Peirce, *The Imperial Harem: Women and Sovereign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85. 斯坦福·肖也提到塞利姆杀子，但没有注明来源。参见 [美国] 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前引书，第108页。

② 史载她是时属波兰王国的西乌克兰一个东正教牧师之女，为克里米亚鞑靼人所掠，辗转被卖到伊斯坦布尔，可能是苏丹的密友宠臣易卜拉欣帕夏将她送给苏丹苏莱曼。她因充满阳光的个性得宠，赐名胡蕾（Hürrem），意为“喜兴之人”，可意译为“喜儿”，欧洲人称其为罗克珊拉娜（Roxalena），意为于斯尼亚少女。她因邀宠和干预朝政著称，在奥斯曼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See http://www.theottomans.org/english/family/ottoman_1.asp, 2012-02-14.

③ [美国] 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前引书，第122页。

④ 苏丹苏莱曼的第一个妃子，名字意译为“福月”，她的另一个名字是居尔巴哈尔（Gülbahar），意译为“春玫”。她是苏莱曼长子穆斯塔法的生母，因宫廷阴谋，其子穆斯塔法被勒死，她也因此长期穷愁潦倒。

国后宫的三大传统。^① 作为一个战略家和宫廷阴谋家，她目标明确、心思缜密，审时度势，择机而动，守则绵里藏针、隐忍不发，攻如晴空霹雳、一击中的，谋定于闺阁之中，成事于千里之外，大智匿踪、杀人无形，就连苏丹苏莱曼的生母哈夫沙苏丹都要让她几分！^②

从现存的胡蕾苏丹与苏莱曼大帝间的信件来看，在苏莱曼大帝离开京城期间，胡蕾苏丹作为苏丹最信任的人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京城情报官的角色。^③ 换个角度，对一个深居后宫的穆斯林妇女来讲，要想掌控帝国首都的情况、尤其是紧急情况，她必须依赖一个可靠的情报网。而建立这样一个情报网，为胡蕾苏丹与帝国各种政治精英人物和集团的联系打开了大门。随着胡蕾苏丹地位的不断上升，她对帝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控制与影响也日益加深。

除了直接参与罢免老臣皮里·穆罕默德帕夏的阴谋从而确立起代夫沙梅势力对帝国政府的垄断之外，胡蕾苏丹还直接“猎杀”了以前的恩主、苏丹苏莱曼少时起形影不离的密友、权倾朝野、威震欧亚非的杰出将帅、曾经获得苏丹苏莱曼免死承诺的宠臣大维齐帕尔加勒·易卜拉欣帕夏！原因很简单，易卜拉欣帕夏支持苏莱曼大帝的长子穆斯塔法。穆斯塔法王子长期驻守边疆，学识渊博，才干过人，处世公正，深得众望，尤其是深得近卫军的支持，被公认为苏丹的继承人，就连胡蕾苏丹所生的王子们都非常羡慕他。^④ 而易卜拉欣帕夏作为一个杰出的传统型政治人物对能力出众的穆斯塔法王子的支持可能更多地出于对苏丹的忠诚、报恩、帝国优胜劣汰的继承传统和为帝国的未来谋划，而不太可能仅仅出于所谓易卜拉欣帕夏-哈迪杰公主-穆斯塔法王子-马希德夫云王妃集团的利益，这从他离京东征后强烈劝阻其妻哈迪杰公主（苏丹苏莱曼的亲妹妹）进宫就可见一斑。^⑤ 但支持穆斯塔法王子与胡蕾苏丹的最高利益直接冲突。在隐忍多年之后，胡蕾苏丹终于等到了老太后于1534年去世之后出现的第一个机会，乘易卜拉欣帕夏东征两年得胜还朝之时，

① 即（1）解放其奴隶身份，正式娶她为合法妻子；（2）打破妃子“一母一子”制，她生了5个儿子1个女儿；（3）打破随子离京赴任制，成为事实上的皇后（尽管奥斯曼帝国没有皇后一说）。此外，她专宠于苏丹，让苏丹将其他妃嫔以处子之身嫁出宫外；她还打破苏丹与妃子及其子女分开居住的传统而搬进并长期住在苏丹宫中，这为她日后策划实施宫廷阴谋并长期干预朝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② See Leslie Peirce, *The Imperial Harem: Women and Sovereign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59.

③ Ibid., pp. 63-65.

④ Ibid., p. 81.

⑤ Ibid., p. 79.

假苏丹之手，一击致命，除掉了她的儿子们继承之路上的第一个大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胡蕾苏丹还开创了与外国大使相互勾结干涉帝国内政外交的先河。^①

但扳倒易卜拉欣帕夏只是扫清其儿子们继承之路的第一步，而穆斯塔法王子才是其心腹大患，也是对她已经长大的儿子们性命的最大威胁。^② 胡蕾苏丹釜底抽薪的第二步是以捏造的贪污罪名罢免流放了时任大维齐哈德姆·苏莱曼帕夏和支持马希德夫云王妃的权臣胡斯雷夫帕夏，为其亲信、其女儿的驸马如斯丹帕夏赢得了大维齐一职。^③ 而正是这位如斯丹帕夏在掣肘和陷害穆斯塔法王子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三步是作为东征指挥官的如斯丹帕夏，将伪造的穆斯塔法王子请求波斯沙阿塔赫马斯普助其废黜其父皇的信转呈苏丹，令苏丹将信将疑。第四步是斯丹帕夏利用穆斯塔法王子在军队、尤其是在近卫军中的威望和苏丹对近卫军的疑惧心理，让苏丹苏莱曼痛下杀机。^④ 此举终结了奥斯曼帝国优胜劣汰的皇位继承制，也在事实上成为了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苏丹苏莱曼在“这世上唯一不会让我悲伤的人”^⑤ 注定了要以其特殊的方式令其身后的土耳其人悲痛感伤了。

（二）朋党政治

帝国的上层建筑最初是由奥斯曼苏丹、突厥贵族和伊斯兰宗教学者即乌莱玛构成的，而根据突厥的传统，苏丹（可汗）与突厥贵族之间具有一定的制衡关系。尽管初期的每位苏丹都是强悍的君主和军事强人，但要维持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他们还必须依赖突厥贵族势力的支持，因为这一时期的帝国军队主要是由突厥贵族所掌握的封建骑兵组成的，而这些骑兵显然会更服从他们的领主。这一点也能从每次征伐所得的战利品的分配中反映出来，它必须按突厥的习惯法分配，苏丹只能取其五分之一（即彭齐克规则）。而在具体的征战过程中，突厥贵族也可能因与苏丹意见不合而消极怠战甚至不愿作战，

① [美国] 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前引书，第132页。

② 苏莱曼一世驼背的儿子吉汉吉尔曾经斗胆问他身体残疾会否逃脱兄弟相残的命运时，苏莱曼回答说，“我的儿子，穆斯塔法将会成为苏丹，并会把你们全部杀死。” See Leslie Peirce, *The Imperial Harem: Women and Sovereign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81.

③ [美国] 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前引书，第139页。

④ See Leslie Peirce, op. cit., p. 83; http://www.theottomans.org/english/family/ottoman_2.asp, 2012-02-14.

⑤ 指胡蕾苏丹，出自苏丹苏莱曼写给胡蕾苏丹的情诗，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uleiman_the_Magnificent, 2012-02-14.

这突出表现在与安纳托利亚各突厥公国的争斗之中。不难理解,初期的奥斯曼帝国与突厥汗国具有某些相似性,比较松散,那些贝依、贝格们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他们更多地是通过利益纽带联结起来的,一旦他们的利益无法满足或者强力君主去世,国家的解体就难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在安纳托利亚各突厥公国中屡见不鲜。

为了削弱突厥贵族势力对苏丹的掣肘并加强中央集权,苏丹奥尔汉着手筹建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领薪的新式军队。在实施代夫沙梅制之后,古兰——那些被征集而来并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教青年,逐步得到重用并且日渐强大起来。经过穆拉德一世和巴耶泽德一世的着力发展,由这些青年组成的新军规模不断扩大和加强而成为奥斯曼军队的中坚力量,他们中的杰出人物也逐步进入奥斯曼行政机构之中,成为突厥贵族势力的竞争对手。

至穆罕默德二世时期,虽然以大维齐羌达勒·哈利勒(Çandarlı Halil)家族为首的突厥贵族势力仍很强大,但苏丹的奴隶——代夫沙梅们已经具备了与他们分庭抗礼的实力。其后的巴耶泽德二世和塞里姆一世虽然都是倚重古兰出身的代夫沙梅们尤其是近卫军的支持才夺得大位的,但为了摆脱代夫沙梅尤其是近卫军的控制、夺回和巩固自身的权力,他们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保持了代夫沙梅势力、近卫军与突厥贵族之间的权力平衡。^①

然而,到了苏莱曼时期,这一平衡终于被打破了。代夫沙梅与苏丹的后宫相互勾结、合谋挑起了苏莱曼一世对时任大维齐的突厥贵族皮里·穆罕默德帕夏的猜忌。皮里·穆罕默德是塞里姆一世的最后一位大维齐,也是他将苏莱曼顺利扶上皇位的,作为两朝老臣,在帝国国内可谓位高权重,另一方面,他军功赫赫,功高震主。因此,他的下野(1523年6月27日),与其全部归因于宫廷阴谋,不如说是苏丹本人的想法,苏丹更愿意任用自己少时的奴隶与密友帕尔加勒·易卜拉欣帕夏!^② 而从皮里·穆罕默德帕夏下野归田9年后(1532年)还被继任的易卜拉欣帕夏毒死来看,其影响仍不可小觑。因此,说皮里·穆罕默德帕夏的下野标志着代夫沙梅势力的全面胜利可能还有些过早,^③ 但在他死后大部分突厥贵族退回到自己在安纳托利亚的封地,并从此远离帝国权力中心,其原因恐怕不在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而主要出在苏

① [美国] 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前引书,第92,98~99,104,108、111页。

② See Leslie Peirce, *op. cit.*, pp. 73, 75.

③ 此观点请参见[美国] 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前引书,第122页。

丹苏莱曼一世身上。因为即使是与突厥贵族积怨甚深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在罢免羌达勒·哈利勒之后，在重点打击突厥贵族势力的分立倾向之时，也刻意谋求双方的平衡。^①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以下结果：不再受到突厥贵族挑战的代夫沙梅分裂成了许多由个人领导的政治集团，他们不用再服从代夫沙梅的整体利益，而开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相互倾轧，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尽心竭力地为苏丹和帝国服务。^②从此，帝国进入了朋党政治的新时代。而作为这一时代的开场白，获胜出任大维齐的易卜拉欣帕夏将其以前的盟友阿纳武特·艾哈迈德帕夏（Arnavut Ahmet Paşa）支到了埃及、从而远离帝国权力中心，而心怀不满的后者几个月后（1524年1月）就在埃及发动了公开叛乱，并宣布自己是埃及的苏丹。

及至想终止后宫干政、强化中央集权的大维齐、苏丹苏莱曼的妹夫卢特菲帕夏为朋党所推翻，以及胡蕾苏丹的亲信、驸马如斯丹帕夏的崛起和长期执政，奥斯曼帝国不可避免地开始走下坡路了。

（三）财经困境

到苏莱曼统治中期，虽然奥斯曼帝国在东西两边的战争还不时发生，但帝国的边界基本上确定了下来。换句话说，帝国的扩张已经接近其能力的极限，这对一个专门从事征服扩张的军事帝国来说，其影响十分深远。一方面，由于奥斯曼帝国东西两线长期的战争，致使正常的东西方商贸往来面临过多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帝国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这是促使部分欧洲国家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并进行海外殖民的一个重要原因。^③而到了苏莱曼统治中后期，欧洲贸易的重心已经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④，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伊斯坦布尔作为欧亚贸易金桥的地位并造成了帝国税收的减少。而且随着欧洲人美洲殖民的发展与“价格革命”的传递效应的影响，廉价的美洲白银涌入奥斯曼帝国，换走了大量粮食与原料，加剧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通货膨胀。^⑤

① [美国] 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前引书，第79~80页。

② 同上书，第122页。

③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前引书，第3页。

④ Reşat Kasaba,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p. 12.

⑤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前引书，第18页。[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35页。

另一方面，在苏莱曼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快速增长，从1200万人猛增到2200万人，而与帝国扩张能力衰减相应的是帝国的耕地面积增长缓慢，因此，过剩的农村人口纷纷涌向城市寻求出路，而大量农民进城又造成市民失业、粮食短缺和物价飞涨，从而形成了帝国有限的资源与过剩的人口之间的矛盾。

此外，由于帝国连年用兵，所费不貲，而东西两线的拉锯战和消耗战又无法获得以前大规模劫掠扩张所能得到的回报，因此国库空虚，入不敷出，而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令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库更是雪上加霜。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帝国政府只好在税收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加强对内压榨。^①而这也是为什么苏莱曼和胡蕾苏丹唯一的女婿如苏丹帕夏能够长期担任大维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此，勿论此人的做法如何不得人心，也勿论时人如何反感这位政治新贵，作为结果，在其当政期间，帝国财政状况确实稳定下来。^②然而，这种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短视做法只解决了苏丹和帝国眼前的难题，却动摇了整个帝国的根基。此时的帝国君臣不仅还不能洞察新航路开辟与欧洲海外殖民的巨大影响，甚至无法解决以前白银外流带来的通货膨胀与后来美洲贱价白银涌入造成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给帝国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害。^③

因此，史家看到的是，面对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不堪压榨的农民纷纷逃离自己耕作的土地，承担封建义务的蒂玛持有人无法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履行军事义务，相反，他们中许多人开始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劫掠商旅、乡村与城镇，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加剧了整个帝国范围内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而为了对付这种史称“杰拉勒”的叛乱，苏丹派遣近卫军前往镇压，并让近卫军长期驻守地方，替代了以前封建骑兵和军事采邑主的部分职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近卫军不仅无法根除“杰拉勒”叛乱、恢复地方秩序，反而逐步背离了为苏丹献身的精神，开始与地方权贵同流合污，接管和控制驻地各种有利可图的营生，军纪、操练废弛，生活日益腐化。^④帝国中央与地方官员非但无力控制局面，反而利用职权，收

① [美国] 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前引书，第143页。

② Leslie Peirce, op. cit., p. 77.

③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前引书，第35~36页。

④ [美国] 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前引书，第143, 221, 225页。

受贿赂，参与走私，中饱私囊。^① 在卢特菲帕夏去职之后，朝中官员各个为已盘算，利用帝国的困境为已谋利，而不是为帝国解忧。在这种情况下，帝国走向衰落就是无可避免的事了。

（四）米勒特制度与治外法权

所谓米勒特制度，按吴于廑、齐世荣的解释，是指“非穆斯林宗教团体或氏族在不损害帝国利益并承担规定的税捐义务的基础上，保持本民族语言文字、拥有专门的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享受充分的内部自治权”^② 的一种制度安排，是穆斯林宗教宽容的一种体现。

事实上，对“有经人”的宽容是伊斯兰的传统，奥斯曼人很早就继承了这一传统。只要非穆斯林臣民（Zimmis）、读书人、犹太人、基督徒等等接受穆斯林的统治并支付人头税（Cizye）以代替兵役，其生命、财产和信仰悉得保障。及至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苏丹按照拜占庭皇帝任命大主教的惯例，任命反对与罗马天主教联合的吉那迪乌斯·斯科拉利乌斯（Gennadius Scholarius）为大主教，授予他管理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徒的民事和宗教权力，正式创立了以宗教划分、内部高度自治的米勒特制度。其后该制度扩展到帝国境内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非穆斯林社团。从这一制度安排中，各宗教教会成为奥斯曼扩张的受益者，教会领袖获得了先前基督教统治时期无法比拟的统治权。^③

奥斯曼帝国政府不仅对待本国的非穆斯林臣民如此，对在奥斯曼的某些外国人也是如此。早在巴耶泽德一世时期，拉古萨城邦和热那亚共和国在向苏丹表示效忠之后，就获得了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继续从事商贸活动的权利，并且两邦驻奥斯曼帝国的领事被赋予了按本邦法律管理各自商人的特权，而不受奥斯曼帝国行政司法官员的管辖。这是奥斯曼帝国给予基督徒的第一个让步条约（the Capitulations），也被视为后来臭名昭著的治外法权的开端。^④

到苏莱曼时期，为了对付哈布斯堡王朝从海上的军事进攻，奥斯曼人与法国人正式结盟。1536年2月18日，参照以前与热那亚、威尼斯所订协议签

① Reşat Kasaba, op. cit., p. 12.

②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前引书，第240页。

③ [美国] 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前引书，第80，196~199，213页。黄维民著：前引书，第190页。

④ 同上书，第196~197页。

署了与法国的贸易协议。协议规定苏丹领土上的法国商人接受法国在伊斯坦布尔代表依据法国法律的管理，而不受奥斯曼法律的管辖；双方在对方领土上享有自由航行和进行贸易的权利，并享受低关税待遇；法国领事负责处理法国臣民之间的民事、刑事案件；涉及奥斯曼臣民的民事案件必须在奥斯曼法庭依照奥斯曼法律审理，但法方被告可向法国领事求助；涉及奥斯曼臣民的刑事案件由大维齐或其代理人审理，双方臣民的口供具有同等效力等等。该条约后来被正式称为让步条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条款规定优先于所有奥斯曼帝国的法律法规。其后，以这一条约为范本，奥斯曼帝国随意将贸易特许权“恩赐”给其他欧洲国家。^①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谈判签署这一协议的时候，法国大使早就与帝国后宫相勾结，插手干预帝国内政外交了，其结果是声名赫赫的大维齐易卜拉欣帕夏被勒死宫中和胡蕾苏丹的巨大胜利，而这一事件距离该协议签署还不到一个月。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也预示了治外法权的未来与帝国的宿命。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位英明一世的穆斯林君主过了很久才明白，无论怎样笼络，其基督教盟友及其承诺并不可靠。世界上永恒的不仅仅是利益，还有基于异质文明的心理鸿沟。而这一点，即使是21世纪梦想融入西方的土耳其精英也倍感困扰。

英君圣主时代的终结

苏莱曼大帝作为一代英武盖世的君主，创造了奥斯曼帝国的盛世辉煌和荣耀，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这一方面表现在，其一，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迅速扩张并大致固定了下来，极盛之时，江河万里，四海升平；国威浩荡，四夷卑服，成为其时最伟大的伊斯兰帝国，也确立了自己当时“一超多强”的超级强国的地位。其二，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结构和法律体系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完善而成为其后数百年奥斯曼人遵循、效法和追求的范版。

但是作为事情的另一面，无论其时相对其对手拥有多么巨大的军事优势和心理优势，这位自称“万王之王”、“真主在人间的影子”的突厥王，在当

^① [美国] 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前引书，第131，211~212页。黄维民著：前引书，第197页。

时的历史条件下，向东无法彻底征服坚韧顽强的波斯王，向西无法征服屡败屡战的哈布斯堡王朝，两线作战的态势极大地消耗了奥斯曼帝国的国力，这种局面直到穆拉德四世时期才得以根本改观。而彼时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波斯沙法维王朝双方都已经失去了扩张的势头而明显走下坡路了。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专制君主，苏莱曼一世多疑与容易走极端的个性缺陷与中后期的昏聩与腐败，如前所述，也给帝国的未来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伴随着苏莱曼大帝的去世和优胜劣汰的皇权继承制的终结，英君圣主独断专行的个人专制统治的时代结束了，后宫嫔妃、代夫沙梅与近卫军逐步登上了帝国政治的前台，奥斯曼帝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盛世后时代。

An Analysis on Suleiman I's Heyday of the Ottoman Empire

Jiang Mingxin

Abstract: Suleiman I, the greatest Sultan in the Ottoman history, brought unprecedented pride and prosperity to the Ottoman Empire. Nevertheless, harem politics, clique politic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the abuses of Millet privileges formed during his reign not only terminated the age of eminent monarchy which had lasted ten generations in the Osman family, but also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decline of the Ottoman Empire.

Key Words: Political History; Ottoman Empire; Suleiman I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